

王雲五主編  
劉延濤編

民國王右任先生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年一月初版

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 一冊

基本定價一元八角正

編者 劉延濤

主編者 王雲五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及  
發行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諸君之訂，或曰按王中一人乎哉，不知上所謂  
 之注也久，吾人知者，誠見其或遺物也  
 功者，陳本所謂之既，吾人不知其之史也  
 都諸君，古代其北原以諸君之名以諸君之  
 解者，歷代，其與歷代之史也，其諸君之  
 通者，不利於諸君之記我，其諸君之  
 其力也，其諸君之史也，其諸君之  
 其，其諸君之史也，其諸君之  
 其，其諸君之史也，其諸君之  
 其，其諸君之史也，其諸君之



此乃之學門也，達向新造人其心及土地者也  
卷八、合計已至二百餘以上。即憶の十年而來  
是之功、如左二三番、若一而經訪遊候可計五  
、另不記述三万餘處也；一而巡行檢査及具届  
方内志地所、制定仍留二万餘；一而巡視確  
當索引、各名後呈報之改當引、現在一二万爲  
之數、所集衆多諸索引之才成、二万餘以終正  
書之取定配證、世々傳習索引、俟將孤本之  
之讀見り多敷、故諸重少は乃善耳歟、然此後  
乃、用印決定の日本年四月末毎月常於十餘、今

精算り、其收支も同大正院一萬廿二百年、重  
 大なる多し二十の年式三十二年、計三百年也、主  
 府政大不承友、廿の年式戦了後小、字體二部  
 並に親、左京土地家お作廿二百年、信守格道  
 下の有柳、傳の四原最景お、人、久保中め  
 の者、字體略小、那穴を譲め多めの中は以ハ  
 五七、因一持好うの西高、田寺諸理改成而が  
 大、且善心主むる古ハ一致、右方住地の内業生  
 明わぬ仙入事分月、如前法護所橋、惣同年  
 在堂殿必、當不難道心切訪也。是の方

##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本館劫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冊，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十三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合計不下二百餘種，得暇輒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爲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爲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爲勝朝所撰，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無不刪汰，甚或曲筆爲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爲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刪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持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爲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迫真；然合冶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爲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以共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懲前毖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爲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刊，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緬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製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百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製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始便從事。因即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輯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爲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爲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朗然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人人文庫本爲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爲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爲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成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爲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治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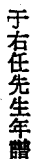
## 序

年譜依編年順序記載一人生平之事蹟，宋以後名人往往有之，大抵爲譜主自訂，或爲門生故舊所撰，亦有後人於古代名人就其著述，考其事蹟，爲之編訂者。年譜所述言行事實，大都詳確，可補史書之厥失，此其可貴處。

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歷代名人年譜，始於上海，主其事者爲本館王故董事長雲五先生。遷台後，及雲老復主持本館，以前在大陸所藏圖籍散佚，重新蒐集，歷年所得舊刊新著，已達二百餘種，定名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自民國六十七年四月起分輯發行，每輯十冊，迄六十八年雲老逝世之時，已刊行六輯。七輯以後自本年起照原定計畫陸續刊行。今雲老雖已謝世，不克親睹全部計畫之完成，然各輯目錄早經其生前決定，爲誌其四十餘年來與年譜集成之編輯工作相始終，仍標明雲老主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

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日



# 于右任先生年譜編後記「代序」

劉延濤

余民國五十二年編先生年譜，曾於篇首小記云：「先生年譜之編理，似易而實難：易者，先生神明不衰，遇事可以詢問；難者，事之重要者，先生皆不許著筆，謂國家大事，他日國史自有記載，莫使世人謂予自宣傳也。」此日之作，去先生逝世已十有四年，其易者，不復存在；其難者，固可逐背先生諄諄告誡乎？默思者數越月，乃仍決定無改於先生之道，是耶？非耶？先生有知，其能於冥冥之中，有以啓示之乎？謹爲之記，以俟諸異日。再者，本編承許師愼先生多所補正，特誌於此，以表謝忱。

編于先生年譜竟，有深感焉，約可分爲十五事：

(一) 向使無先生之革命報紙，以爲革命之鼓盪，則辛亥革命之能否及時成功，實爲未知之數；先生所辦報紙，第一是神州日報，以宣揚民族精神爲主旨。第二是民呼報，多抨擊貪官污吏之作。第三爲民吁報，由抨擊貪官污吏進而爲對國際侵略者的聲討，第四爲民立報，民立報仍可分爲兩個階段，前者注重於政府黑暗之揭發，後者則爲鼓吹革命，而民立報社亦爲革命同志之重鎮矣。故民元之國民政府，即以民立報社同志爲骨幹。袁世凱云：「辛亥革命之成功，得力於民立報之宣傳者爲多。」袁氏固不失爲一代梟雄。

(二) 向使無先生創辦之復旦與中國公學，以爲革命同志之培養，則此後革命之進行，與基本幹部之需應，實爲重大問題。此觀於此後之革命經過，與夫政府中兩校同志之衆多，可以證之。

(三) 向使無先生於民國七年至十一年，總鉞靖國軍苦戰於西北，以牽掣北洋數萬大軍之南下，則南方之革命情勢爲何如耶？

(四) 向使無靖國軍舊部之伏著，以促成國民二軍之革命，南北呼應；以及先生重整西北舊部出潼關入河南迫使北洋軍瓦解，則革命軍之北伐，能如斯之摧枯拉朽乎？

(五)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黨、政、軍方之諸多紛歧，若無先生奔走陳詞，潛移默運，而能終致相忍爲國乎？

(六) 向使無先生不以超然精神主持監察院，或政府不以言德功兼孚之先生領導監察院，則五權憲法之監察權能獨立否？

(七) 先生一生無小組織，無公敵。嘗言：「國一耳，黨一耳，真是非一耳！」故能於困擾之際，片言解紛。故先生之言，人皆以爲天下之公言。然若出之他人之口，則便有所軒輊矣！

(八) 先生對於政府的立言曰：「一方面決不站在狹義的階級利益上打算，一方面也決不輕看舊社會組織之缺陷，和新社會關係之危機。……關於民權的需要，就是決定如何訓練人民行使政權，如何使革命的民權，爲革命的民衆所享有。」（二十年六月八日，先生在國民政府紀念週講詞）。

(九) 先生對於黨的立言曰：「黨員所在之處，即是任何敵人無計可施之處。」（二十年十月五日紀念週報告。）又云：「黨的紀律，也不能輕易使用。若隨便以紀律爲制裁，或隨便通融於

紀律之下，使得黨員輕於嘗試，則紀律必有時而窮，而紀律的裁制，也就等於零了！」又云：「……許多黨員的工作，往往只知對黨部工作，黨離開了民衆，究竟要黨何用？同時黨離開民衆，也就是民衆離開了黨。一個黨而使民衆離開了，這個黨就不能不亡，決不能生存下去的。而且民衆離開了黨，黨員不知道，黨部也不知道，大家不自知其陷於危境，黨的軀壳雖在，黨的精神已不在了。」（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四全大會紀念週報告。）又云：「要使國民革命所得到的利益，能够達到農人工人的身上。」（二十年三月十六日，國父紀念週講詞。）

(H) 先生對於監察院的立言曰：「監察院，是自由中國的一座燈塔。」（民國四十二年總檢討會）又云：「我們要監察人家，更要模範人家。我們要知道模範的力量，比監察的力量更大！」（同上）又云：「我們不能使選舉我們的人民失望，更不能使本屆以後的監察委員說我們斷送了監察職權」（四十五年三月份紀念月會）又云：「要知道我們在監督政府，我們的身後也還有老百姓來監督我們。」（同上）又云：「使人知道監察人的人，同樣嚴格的也在監察自己，檢點自己；使選舉我們的父老子弟，知道我們的成就，也知道我們的作風。我們也無時不彷彿聽到他們呼名而督責的與呼喚的聲音在我們的耳邊」（同年總檢討會閉幕詞）又云：「自愛者，必愛國；愛國者，必自愛。惟自愛愛國者，始能以大公無私的氣度，推行工作，以肩荷成己成人的大任。」（同上）

(I) 先生是元老記者，他畢生不忘記者生活，但他最看重「新聞道德」。在民立報「天聲人

語」欄內有云：「新聞記者之誤國誤民，其罪更甚於劣等官吏。」觀夫大陸淪陷前之「新華社」及左傾報紙，益徵先生之先見。又在「上海春秋」欄內云：「故凡語一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存真是非於社會，執筆人之責也。故社會中有真是非，而後有真人物。」抗戰勝利，復旦大學新聞館落成，先生演講有云：「爲維護新聞自由，爲珍重新聞自由，必須要恪守新聞道德，新聞道德與新聞自由，是相輔相成。沒有道德的新聞記者，把新聞自由隨便玩弄，其流弊與禍害，固不堪言；而辛苦奮鬥所得之新聞自由，終不能保持。所以新聞自由之是否能保持與擴充，全恃新聞記者的新聞道德！」

(四) 先生最愛接近青年，每言與青年人相處，於其動作中，語言中，與真率而自負中，多少可以找回自己的青年時代！每於青年節，多勉勵青年爲自己的黃花岡而奮鬥！民國五十三年七月二日（也就是先生逝世之年。）先生接見大專院校本屆畢業僑生代表團時，仍以「立志」二字勉勵各代表，並引王陽明的話說：「志不立，如不繫之舟，無銜之馬，漂蕩不羈，終亦無所止乎？」

(五) 先生論詩學：先生晚年，多主張解放舊詩，謂舊詩拘於平仄，拘於韻。非以辭害意，卽以音害辭。如年譜內所引先後在詩人大會中的演講。來臺後更嘗作白話詩以爲倡導。並主張用「中華新韻」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思想；不要把自己的思想，硬塞入古人的語句裏。先生的詩風雖接近李白，而先生致力處實在杜甫。先生最愛老杜那一種真真實實的生活。更愛老杜那一種喜愛民間，同情貧苦的生活。凡杜詩中的拙澀句子，先生則稱之爲老杜的真本領，說他不避現實，不

肯滑過，也就是不討巧與以辭害意的地方。惟對杜甫「一飯未曾留俗客」句，則歎息一聲說：「此老也太爲『已甚』了！但徐徐又曰：『不過也要看是什麼樣的俗客了哩！』」

(四) 先生論藝術：四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先生在自由中國美術展覽前夕，發表「爭取自由」謂：「藝術是自由的表現，沒有自由，也就沒有藝術。」又云：「在奴役之下，也許可以開運河，也許可以築長城，但是決不能產生真正的藝術。甚至在名利誘惑之下，也不能有真正的藝術產生。因爲藝術需絕對的自由來孕育它。一有所迫，一有所爲，他的作品就要患營養不良的病症了。」

(五) 先生論書法：先生爲一代草聖，但從不論「法」，與沈尹默恰恰相反。人有問者，則答以「多寫便工。」惟在重慶臨標準草書時，無意中透漏了一個三字訣，就是「無死筆。」說字有死筆，便如人之四肢有偏廢，世有以偏廢不仁爲美者乎，無有也。無死筆，則如健康活潑之人，自有不蘄美之美存焉！故若謂「無死筆」爲三字訣，則「活」字卽一字金丹。

讀先生民國五十三年日記，知先生晚年多看新舊約。一月十三日記云：「有友人以予看聖經爲多事者，予曰：『予有十三經，豈能棄之！』」二十二日記中又云：「我是儒家系統中人，守之不變者。萬勿中道迷離，爲世人所笑。守一不變者，今之世則不然；變者多矣，我則以道自守。」又云：「萬勿爲名教上之戴高樂！」「守一不變」，實貫徹先生之一生。試觀革命以來，守一不變者有幾人，先生一生，無一語不爲黨，亦無一事不爲黨。無一語不站在中央立場，亦無一事

不站在中央立場。無一語爲私，亦無一事爲私。先生立身行己，亦俠亦儒，而仍執兩用中以守一。故能俠而不偏激，儒而不迂腐。而先生之胸襟浩然氣象，多可於其自撰，或改撰之書聯中見之，如云：「與人樂其樂，爲世平不平。」「清平天下望，博大聖人心。」「吃盡苦中苦，不爲人上人。」「無私乃天道，不役是人倫。」「樂同少長老，氣合天地人。」「心積和平氣，手成天地功。」「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雲龍風虎新時代，民物乾坤舊座銘。」「觀天地生物氣象，學聖賢克己工夫。」……凡此皆可爲先生平生修持工夫與精神寫照。李二曲云：「自奮自立，超然於高明廣大之域」以爲萬世勸乎治，其斯人之謂歟？雖然，先生猶有遺恨焉。先生曾沉痛言之：一、先生早期之摯友爲黃克強、楊篤生、宋教仁、陳英士，以及民立報社同仁，而皆於英年早逝！致使當時之諸多計畫，未能實現，或實現過遲。二、未能出國留學或考察，致使未能與世界之大學者，大政治家接觸而局限了自己，也使自己對國家建設心餘而力絀。三、未能一赴金門，慰問戰士，而懸望大陸。（此在先生日記中屢屢言之。甚至在先生五十三年日記中（二月五日）仍說：「我將到金門去看看！」）

又憶先生於三十八年在廣州時，每日下午必驅車至黃花岡，徘徊瞻眺，幾於無間風雨。余亦時獲隨侍杖履。一日讀黃花岡烈士題名碑，略爲統計其籍貫，則以隸福建連江縣者最多。予問以故，先生答曰：「連江最窮！」先生對於此一「窮」字，唸得最重。余初爲之愕然，繼爲之駭然，「窮」之重要有如斯者！先生亦自言「窮」是他的光榮，也是黨的光榮。惟其然也，故先生在